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 成果要报 》

2015年第18期

（总第18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编

2015年12月29日

我国应对“新常态”不应重蹈美国覆辙

齐昊

【内容简介】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中国主动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其与“长期停滞”截然不同。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利润率下滑，主要风险是金融部门过度膨胀。“新常态”下，中国应依靠财政政策和国有企业，避免重蹈美国危机后“轻财政、重货币”的覆辙。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和美国经济“新常态”截然不同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陷入停滞。美国经济虽然从经济数据上看有复苏迹象，但失业、贫困、贫富分化、工资停滞、投资停滞等重要问题并没有解决。“新常态”一词最早被用来形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危机之后的“长期停滞”状态。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我们主动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其理论含义与“长期停滞”截然不同。

从一些衡量经济基本情况的关键指标来看，中国经济要比美国经济好得多。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利润和资本存量之比衡量企业部门的利润率。研究发现2014年我国企业部门的利润率是17.4%，而美国企业部门的利润率只有12%—13%。此外，我国企业部门的利润率明显高于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较高的利润率说明我国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仍然有能力保持较快的资本积累，从而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并缩小我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

二、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利润率下滑，主要风险是金融部门过度膨胀

从变化趋势来看，我国企业部门的利润率在1999—2007年之间处于上升之中，2007—2014年则处于下滑之中。1999年、

2007年和2014年的利润率分别为16.3%、22.0%和17.4%。利润率在2007年之后的下滑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第一，世界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陷入停滞，导致我国出口市场萎缩，并通过投资者信心等各种渠道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第二，工资增长在1998—2007年之间一直落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普通劳动者一些生活需要难以靠工资满足，所以企业要想进一步降低工资基本没有空间。2007年之后工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但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下滑更大，导致企业感受到工资压力。第三，2007年之后，除2009年我国实行大规模经济刺激之外，投资增速处于下滑之中，并且投资增速的下滑会通过影响企业信心而自我加强，进一步导致投资增速下滑。第四，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吸引资本从实体经济流向金融领域，从而减少了企业的资本积累量，导致投资增速下滑。

以上四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对我国来说是不可控的外部因素；第二个因素涉及普通群众的正常生活和合理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正常变化，需要我们主动面对而不能故意压制工资上涨；第三个因素是投资增长放缓的正常后果；第四个因素涉及金融部门的过度膨胀，是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

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分析，我们以总剩余价值和资本存量之比衡量企业部门的潜在利润率。潜在利润率是一个经济体所能达到的最高利润率水平，由于金融等非生产部门会抽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所以利润率会低于潜在利润率。2014年我

国的潜在利润率为25.8%，其中有将近三分之一被金融等非生产部门抽取，可用于资本积累的部分占三分之二。2007—2014年，金融等非生产部门抽取的剩余价值占全部剩余价值的比例从28.8%上升到32.5%。我国必须警惕金融部门过度抽取过多剩余价值对资本积累造成负面影响。美国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2013年美国59.8%的剩余价值被金融等非生产部门抽取，只有40.2%的剩余价值可用于资本积累。这是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危机之后资本积累以及经济增长将处于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应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应依靠财政政策和国有企业，避免重蹈美国危机后“轻财政、重货币”的覆辙

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既要看到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能力没有改变这一基本事实，也要看到我国经济所面临的多种问题和风险的叠加。避免风险、解决问题、发挥优势需要我国不拘一格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坚决避免重蹈美国覆辙。美国在危机后重振经济的基本思路就是以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以恢复资产价格为目标，而在财政政策方面则以减税和福利补贴为主。美国保守势力认为财政刺激政策是在用纳税人的钱补贴“懒惰的穷人”，政府应该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受到保守势力的压力，美国政府没有能力采取以投资为主的财政刺激政策。这套“轻财政、重货币”的基本思路在危机发生七年之后并没有

使美国经济彻底恢复，美联储仍然担忧停止量化宽松政策之后会影响美国经济的复苏，经济学界对美国经济“长期停滞”的讨论越来越普遍。金融机构坐拥量化宽松增发的货币，资本难以流向实体经济，导致资本积累仍停滞不前。不仅如此，以恢复资产价格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就业机会的减少、工资的停滞导致美国的贫富分化在2008年之后进一步加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专门撰文批评量化宽松进一步加重了贫富分化。反思美国失败的经济政策，我国主动应对“新常态”的经济政策应坚持三个原则。

第一，在政策目标上以保证就业为目标，防止企业大规模破产，防止失业大量增加。2015年以来，由于股市波动，我国金融业对GDP增长的贡献迅速增加，已达到三分之一，然而金融业对就业的贡献很小，导致GDP增长和就业增长有可能发生偏离，使我国出现美国、欧洲、印度等地所出现的“没有就业增长的GDP增长”现象。这提醒我们，在政策目标上更加注重具体效果而不是统计数字。同时，我国不能效仿美国以资产价格为目标，而应该保持资产价格稳定，防止资产价格大幅波动。

第二，在政策选择上以财政刺激政策为主，通过财政刺激拉动投资，扩大内需，重振企业信心。货币政策应该当好配角，配合财政刺激政策。我国如果效仿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必然加重金融部门的过度膨胀，加大金融风险，导致可用于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进一步减少，并且还会恶化贫富分化问题。

第三，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经济稳定器的功能，适当弱化国有企业追逐利润的动机。在利润率下滑、私有企业投资羸弱的情况下，结合财政刺激政策加强国有企业投资，引导国有企业向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民生、新能源、先进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带动全社会投资增长。美国没有中国这样的国有部门，所以美国的财政刺激政策的方式和作用都受到极大限制。我国不能把美国的缺点当成模仿的对象，而应该主动发挥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使其为寻找新经济增长点的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齐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